

在重大判断指引下再创新辉煌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述评

□ 黄泰岩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理论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产业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技术创新从跟随并盾转向并肩引领,收入分配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追求共同富裕,对外开放从低层次的单向开放转向更高层次的双向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基本清晰转向基本定型,等等。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相结合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理论,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经济学,即为全体人民谋取最大利益的经济学。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实现发展的经济学、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二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贯穿于经济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从而要求在推进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内在要求、以绿色为基本条件、以开放为必由之路、以共享为发展目标,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大地又超越西方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学说的新发展理论。

三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发展目标。把“两个一百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从而要求到2020年即建党一百周年时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2050年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是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研究对象。把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要求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又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主要矛盾发展了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对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做出的重大判断。基于这一重大判断,我们指导改革发展新实践,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与此同时,在认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相结合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理论,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并将继续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任务。

五是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制度特征。

六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进一步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要求既发挥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具优势的运行机制。

七是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把“稳”和“进”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在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叠加的复杂形势下把稳作为主基调,作为大局,并在稳的前提下在一些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好新时期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八是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相适应;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区域协调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新阶段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九是以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为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从沿海开放向沿海沿江开放扩展,从对发达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扩展,从主要是“引进来”向“走出去”扩展,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向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扩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新理论。

新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

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新理论,有效地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实践,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新成就。

分享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 王 祥

分享经济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经济新模式,它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实现了个体之间直接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从理论上讲,它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的总和。我国对分享经济这一经济新模式非常重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提出要“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发展速度迅猛,且规模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34520亿元,比2015年增长103%,预计未来5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

分享经济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分享经济模式,能够将孤立、分散、低价值、低效率的制造体系发展优化成为完整、高价值、高效率的制造体系。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来看,分享经济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经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正

境中创造价值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通过汇集创新创业资源,分享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信息技术、终端平台、服务交易、商品共享等各个层面创造出新的供给,由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新机遇。

其次,分享经济能够实现制造业企业之间对生产能力的分享。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经济能够将不同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整合,实现产品的需求方和生产力的供应方最有效对接的新型生产模式。从目前分享经济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应用效果来看,其生产能力分享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我国工业能源、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等方面的分享制造模式应用越来越普遍,在制造业领域已逐渐形成了有影响力的一体化产能分享平台。随着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大规模一体化的生产能力分享平台必将进一步完善。在这种条件下,供需双方将进一步通过分享平台实现产品的定制、生产,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资源,形成便捷灵活的生产制造网络。

最后,分享经济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分享经济在制造领域的应用,优势之一是降低了生产

经济发展实现了中高速的稳定增长。从世界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成功跨越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都没能成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日本1961—1973年间实现高速增长,年均增速8.78%,但高速增长结束后的1974—1991年间,平均增速降为4.09%,资产泡沫破灭后的1992—2015年间,平均增速仅为0.8%。韩国1963—1991年间实现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9.57%,但高速增长结束后的1992—2007年间,平均增速降为5.68%,2008—2015年间又降为3.11%。我国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面临国内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但经济增长保持了中高速,2013—2016年平均增速达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打破了“高速增长后必然进入中低速增长”的传统,为世界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经验。

经济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过近几年的攻坚克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快速形成:消费已成为主要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13年的47%提升到2017年上半年的63.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迅速从46.7%提高到2016年的51.6%,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2013—2016年前者年均实际增长9.4%,后者年均实际增长11.3%;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1.99%提高到2.08%,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25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8月12日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正在继续保持向可持续的增长,在很多领域取得进展。

经济体制改革完成四梁八柱性构建。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在此基础上,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关键领域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基本完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使改革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和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民生取得明显改善。就业是民生之本,2013—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2012—2016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同期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最高点0.491下降到2016年的0.46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从2012年的2.88倍降为2016年的2.72,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缩小;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确定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

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基本成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周边国家贸易大幅增长,产能合作和跨境合作广泛开展,继在沿海开放和对发达国家开放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我国沿江沿海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新格局;我国自贸试验区已形成“1+3+7”发展格局,成为新一轮开放重要平台;“亚投行”、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使我国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大幅提升;2016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形成6.3亿消费者。

最后,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创新驱动,一方面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焕发传统产业新活力,《2017工业化蓝皮书》指出,我国工业化综合指数为84,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工业化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据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工业化有能力有空间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8%提高到15%,按照国家发改委对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环节的资源,最终都会汇聚在分享平台当中,这样将消除制造业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制约,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实现制造业领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境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经济建设领域,我们党在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还将指导我国经济继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开辟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首先,继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经济发展开辟正确道路。创新发展将引领我国继续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协调发展将引领我国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供需结构等重大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将引领我国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开放发展将引领我国从注重“引进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共享发展将引领我国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其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内在动力和广阔空间。坚持改革发展为了人民,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大幅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坚持改革发展紧紧依靠人民,倾听人民呼声,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就可以迸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和激情,2014—2016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4400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362万户,年均增长30%,成为促进发展的源头活水;坚持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就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持续的消费动能。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到2020年,我国中高收入人口和富裕家庭的数量将增长1倍,达到1亿元,占城市家庭的比重从2015年的17%提高到30%;麦肯锡的预测也认为,到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形成6.3亿消费者。

最后,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创新驱动,一方面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焕发传统产业新活力,《2017工业化蓝皮书》指出,我国工业化综合指数为84,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工业化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据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工业化有能力有空间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8%提高到15%,按照国家发改委对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环节的资源,最终都会汇聚在分享平台当中,这样将消除制造业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制约,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实现制造业领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梁军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这“两个牢牢把握”,是在新的发展阶段谋划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前提,也是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强化城市微观空间治理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要义。

自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重大判断以来,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全过程把握国情、社情,回应人民群众心声,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城镇相比于乡村,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各种要素禀赋高度浓缩,资源与贸易频繁往来,更容易成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等激活新动能、壮大创新活动的土壤。正是在认识到城镇、城市文明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重要性,2013年12月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两年后的2015年12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两个会议均与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期举行,由此可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因为人民群众关心的、导致“城市病”问题的很多深层次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微观空间治理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牢牢把握”,为从微观空间治理上破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确立了逻辑指向与价值立场。

城镇与城市中的微观空间,一般指居民社区、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由道路、车站等相互联系的网状毛细血管式的小环境,广大人民群众每天都生产、生活在这些微观空间中。如果社区环境无序、道路拥堵不堪,这些微观的问题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体验,也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初步评价。以这些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强化城市微观空间治理来回应“两个牢牢把握”,应当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首先,强化城市微观空间治理要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根主线。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各级政府在制度供给、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组织群众等方面的调控职能。近代以来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任何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纯粹的乌托邦式安排都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只有“两只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资源错配。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城市微观空间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市场失灵往往难以有效应对,进而导致治理效率的丧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发挥党和政府的动员组织功能,尤其是通过社区、街道等基层组织、政府的动员组织作用,能够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意识,弥补市场在城市微观

治理过程的失灵,实现治理效率的最大化。其次,强化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必须关注并回应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城市微观空间治理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群众利益无小事,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提升城市微观空间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摒弃“管理就是办证,服务就是收费”的旧理念、旧方式,随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迭代更新不断升级社会治理系统的版本。比如,随着小汽车普遍进入百姓家庭,我们居住的许多居民小区车位、道路和绿化系统都需要规划、改造和提升,否则消防、急救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道路通行就会严重受阻,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在进行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工作时要意识到,当经济社会发展突然加速,在我们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出现社会治理手段跟不上客观情况的变化时,人民群众大多能够理解。但若“硬件”已更新很长时间,而“软件”得不到升级的情况持续太久,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会受到影响。

最后,强化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必须在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上加强系统性。这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性,并统筹兼顾国情、民情、世情。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各个行业的微观空间的优化,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理念,也要适应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要从系统论的角度统筹兼顾城市微观空间治理中的所有要素,防止只执一端不顾其余,切忌削足适履东施效颦。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理论部主办
邮箱: gmjx@sina.com 电话: 6707894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